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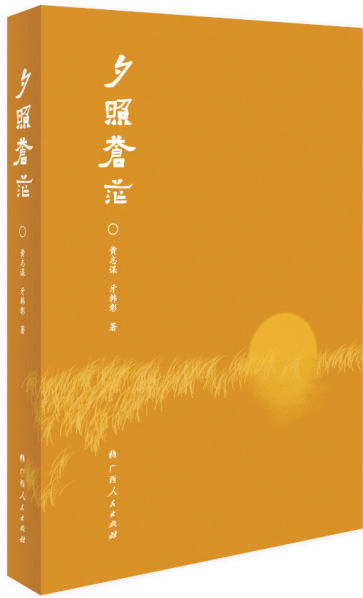
用文献记录形式展述壮族传统神韵

——长篇历史小说《夕照苍茫》阅读札记

□ 丘文桥

所有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哪种体裁,长篇小说尤甚,似乎都会遵循这样的规律:先做加法,然后做减法,从而形成文学的最终成品。最近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夕照苍茫》应该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以彼时体悟对照当时历史可能会导致成品与原型之间必然的落差,而这种落差也可以看出《夕照苍茫》的创作构想:作者是两位壮族作家黄志谋和牙韩彰,他们在创作小说前,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提炼,对土司制度、对壮族的历史,对深厚的广西地域文化,进行了艺术的重新组织,按照总体背景,小说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线索和素材进行创作,为凤阳州末代两任土司韦松原、韦才文父子设计了家族内斗、情仇纠葛等事件,最后韦才文作为凤阳州历史上最后一任土司,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主动放弃土司职位,结束了凤阳州延衍八百多年的封建土司制度。作者对一百多年前原型人物、事件进行了归纳组合,通过小说去反映整个土司制度的衰亡过程,用文献记录展述壮族传统神韵,从而形成了《夕照苍茫》两位作者踵事增华所达到的演绎效果,小说具有历史的广度与深度,不啻桂西壮族传统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作。

很显然,桂西北历史上延绵800多年的土司制度,是尺幅千里的宏阔文化史,从小说创作上来说,需要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纵览全局的磅礴气势,不然很难在一部小说里足够展示具有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等特征的漫长的一段兴衰史,黄志谋、牙韩彰联手所著的长篇小



▲壮族作家黄志谋和牙韩彰合著的长篇小说《夕照苍茫》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说《夕照苍茫》,气魄上确实惊人,通过十九章描绘了土司内外部错综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揭露了土司制度的血腥内幕和夕阳落幕的

过程,在这些激烈较量中绞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人性描摹,作者同时又通过采集的大量壮、瑶特色的民歌、对联,将一幅桂西山川田园的诗情画卷妙趣横生地徐徐铺开,既有历史的沉重记载、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此外,关于描写壮族土司制度题材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意味着《夕照苍茫》将有着它的在壮族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在,小说本身的文献价值。土司文化是广西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小说作者勇于挖掘这一题材,在创作前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走访了故事发生的实地,创作过程中还积极采纳专家关于土司制度涉及民族关系、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建议,在展示桂西地区的神巫文化、民居风俗等均做了归纳。据说就连小说的书名都是经过反复推敲、认证而定。

传统文化的“转化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文化难题。当下,传统文化又呈勃兴之势。长篇小说《夕照苍茫》恰好大量地展示了国学精华——旧体诗词、对联以及壮、瑶民歌等内容,阅读小说的同时更是对于壮文化等传统文化的转化和传承的感受的过程,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阅读体验的趣味性。

作者在叙事形式上是将故事的推进、知识学的论辩、思维的跳跃,诸多叙述方式糅合在了一起,对于壮族民族性的一些习俗的深入剖析,比如桂西壮族的农耕制度、歌圩、婚嫁、

丧葬、节庆等民俗,读者在看到那些历史、宗教、哲学、文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论辩,在这些枯燥的思辨中,读者更会感到这部长篇小说的激情与力量,作者集中火力拷问凤阳州最后两代土司与新的风气的异化与历史的荒诞,可谓穷追猛打,可谓用心良苦。历史记忆与现实感受相互交织,难分彼此。现实搅动历史,历史刺痛现实。叙述的力量,就在两者的焦点之上。《夕照苍茫》就是对着焦点的叙述,这应该也是小说的独特性表现。

同时,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不得不慨叹《夕照苍茫》的提炼功力强大,能够重新设置真实地域上的时间叙事,构现出牵连土司文化全局的最后衰落的人物情节,当我们因循着小说的脉络,去回溯真实的历史的时候,便清晰地了解见证了当时的现实。小说在自身的演义的时空里,同时还非常精准地吻合了民族团结的主题,值得当下倡导民族团结友爱确定下的雄浑、高亢的叙写模式。

《夕照苍茫》贯穿着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倡导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是壮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至少是某段历史的重要见证,更是一部地方文化风情的生动历史。因此从壮族史、壮族文化的认知层面去考究,这部小说的文献记录形式展述壮族传统神韵将意义非凡,其价值甚至超越文学本身。

(作者简介:丘文桥,广西文艺评论协会、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大花房》《静谧的风景》,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年度选本和中学语文教辅教材。)



内在探索与多元表达

——评胡游诗歌创作

□ 付慧明

【胡游简介】湖南湘潭人,1994年生,中国作协会员。2018年获得“青春先锋诗歌奖”。曾入选2018年“文学桂军”新锐作家扶持项目。诗歌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作家》《扬子江诗刊》等,系河池学院创意写作中心教师。



现代诗歌如何建构?这是所有诗人都时常思索的问题。当今的经济化大潮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日常生活进入诗歌的方式与传播途径变得多元,这就导致了诗歌场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面对现代文化的多元冲击,诗人胡游敏锐地捕捉生活中的感受,将个体生命的内在需求通过诗行呈现出来。胡游在创作谈《在破衣服上绣几朵碎花》中说:“文学需要独立思考,需要深刻的人生体验,诗歌需要在场。”所以,胡游诗歌中的自我不是无限扩展的自我,而是基于现实层面多向度呈现的自我,是承载现代社会复杂生存体验的自我。这种复杂的生存体验,也为读者理解其诗歌提供了视角。作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胡游诗歌从多重角度呈现个体生命内在的绝望挣扎与希望渴求。这看似矛盾的话语,却代表着诗人对生命内在的本真姿态的探索。胡游诗歌擅长以真挚的笔触切中生活的横截面,对日常经验进行书写与探寻,呈现出独特的生活感知。作为一名诗人,胡游对当下生活经验的书写也暗含着群体的隐喻,她努力将生活中自身生活的孤独、乡愁、恐惧、困顿、忧患、希望、坚守等传达出来。诗人的写作主题是丰富而多元的,诗人也正是沿着主题的多元,将情感大面化之,融入时代洪流发展的广阔层面。

诗人胡游的目光掠过现代都市的角角落落。她凝视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孤立无援、空虚冷漠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如诗人在《等待》中所写:“我只想像蛇一样冬眠,在饥饿与寒冷的包围中修行。”诗人深感现实的寂寞与严寒,但身处当下,她无法安眠,只好修行。诗人首先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孤独,“相比蝼蚁/我并没有更接近白云/青天还是高不可攀”(《我并不是蝼蚁更接近青天》)。世间纷繁,生命不过是一粒尘埃,如同“打在车窗上的雨水/分离成无数小蝌蚪/从车窗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像我们挣扎的一生/渺小的一生”。人们一生挣扎,发现自己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如同诗人的追问“我是谁?”此时,个体生命生存的孤独感油然而生。而在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状态也非常冷漠,如“对面有个女人也风一样来回”“我想打声招呼,却难以启齿”(《幻觉》)。社交需求的失落使得人们的生活进入更加深刻的孤独中。

胡游诗歌将对现代都市的书写安放在城市场地和城市人物两个层面,将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场景和人物作为意象推出。如早上的地铁、公交车、牙科诊所、龙江河边、滨江东路,如《没有激情

的生活》中提及的咖啡馆、服装店,如《空房子》中提及的学校附近的房子等城市场景。再如城市女子、根雕人、乞丐、清洁工等城市人物共同构成了诗人笔下的城市书写。同时,诗人在关注到城市生活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立无援、空虚冷漠的生存状态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诗歌《早上的地铁》写道:“地铁里都是上班的人”“坐着的人如同结满穗的麦子/低头昏睡/他们还在做梦,从未醒来”,正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个体生命体验通过想象的加工落笔为诗句,诗人的诗学理念也在不断的创作中逐渐走向完善。但阅读胡游诗歌,仅仅注意到其内在纬度是不够的。因为诗人一直在试图冲破个体生命本质的束缚,走向更为广阔的诗歌主题中,对现代都市状态的深沉反思与对乡村书写的真挚热切共同建构着胡游诗歌的世界。

当诗人的笔触转向对乡村主题的描摹,她的情感抒发则为之一变。在《接乡愁回家》中,诗人收起冷厉的笔触,展示出柔情的一面:“我抱着母亲/默默抚着她柔软的头”。在《荨麻》中,诗人写道:“念旧的荨麻知道如何讨爷爷的欢心/在爷爷的手掌里撒娇/并不是所有的女子的命运在喘息/也有荨麻的温顺,一生绵长/当爷爷做完这些事情/就眯着眼睛抽烟/享受空空荡荡的岁月”。诗人将独特的女性意识与乡愁结合,在对比中更呈现出故乡生活的安逸。《清明回家》则寄托着诗人对亲人的深情、对乡村的习俗的体认:“鞭炮声此起彼伏/活人与死人团聚”。

用一首诗歌概括胡游诗歌中的城市与乡村主题,诗歌《读雾霾》恰如其分:“我在长沙,此刻城市有雾霾/听说以前没有/如果不是一个外国人告诉这个词/我们会把它当做乡愁/一辈子活在云里雾里”。在描写乡村主题的诗歌《雷同》中,诗人展示出对城市与乡村关照的不同:“农民的脚步依然沉重/把箩筐里的谷子安放在土坪上/单纯和阴暗的面孔变得一模一样”。在诗人笔下乡村与城市不同,它是纯净的,乡村的单纯和阴暗都消解在劳作之中,达成一种完满的和谐。但在《乡愁断了》中,诗人却展示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诗人书写乡愁的脆弱与沉痛。诗人对现代都市的生活进行批判与反思,她将深情与牵挂寄托在乡愁中。但由于诗人长期远离故土,她与故乡的牵连就如同风筝的线:“有风筝挂在树上/像一个人在风中孤独地颤抖/我呆呆地看了好一会/我们与故乡的那根线断了”。诗人将城乡书写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她与

故乡如同风筝与风筝线般的脆弱联系也使得其更加孤独。

而在九万大山的环绕之中,诗人对事物的感受不可遏制地走向少数民族主题的书写。胡游将少数民族特色融入其诗歌的创作,从中找寻天人合一的质朴情怀,万物有灵的精神信仰。如诗人在诗歌《神话》里写道:“很多神话都那么相似/用自然之道对抗腐朽的权力”。在《蚂拐节》中,诗人写道:“在广西东兰/蚂拐不再是讨厌的癞蛤蟆/它们是雷神的女儿”。在诗人笔下,蚂拐成为神性的存在,它代表着丰收与美好。在《过东兰》中,诗人写:“山上的草木矮小/像是人为贴上去的画面/家家打个露天的井,装些雨水/给自己,也给神灵”。山川树木雨露,在诗人笔下都成为连接神灵的存在。在《神仙山》中诗人写道:“在山顶,我看到/有人在石头上刻几个字/就烧香跪拜/真好,他们拜石头不拜活人”。少数民族独有的朴素信仰融入诗人的创作,成为她诗歌创作理念的组成部分。万物有灵的创作理念除了表现在与广西少数民族书写相关的诗歌中,也表现在囊括的与西藏地区民族特色相关的诗歌中。如诗人在诗歌《罗布林卡》中写道:“藏民脸上的高原红,让我看了又看/阳光对所有的生物与植物都是公平的”,她将阳光看作是有灵性的存在。在诗歌《牦牛》中写道:“在通往纳木错的戈壁滩上/一只牦牛依偎在另一只牦牛的身旁/眼睛澄澈如圣水/直到安息在纳木错的传说里”。在诗人笔下,牦牛就是神的代表,它一步步朝天上走去,如同神灵在存在与隐匿之间自由切换。

艾略特说:“诗歌的目的在于用语言重新表现现代文明的复杂性。”胡游作为新生代的青年诗人,她自觉的承载起年青一代诗歌写作者的责任与使命,她展示出诗歌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消费主义肆虐的今日,胡游依旧坚守诗歌这块心灵之地。她俯下身,倾听城市中隐匿的悲伤和乡村动听的蛙鸣。以个体丰沛的日常经验为出发点,跃进宏大纵深的诗歌主题,在诗歌作品中重构现实,传达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将内在情感具化,形成有诗意的形式,是对诗人创作的考验。面对语言书写的考验,胡游诗歌很好地把握了语言的张力,并借此书写有意义的生活。正如诗人在《麦田与乌鸦》中所写:“成熟的喜悦无边无际/却无法淹没一个孤独的画家。”同样,时代的喧嚣也无法淹没一个孤独的诗人。

(作者简介:付慧明,女,河南人,1995年生,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